

[英]约翰·曼 JOHN MAN 陈一鸣 译

成吉思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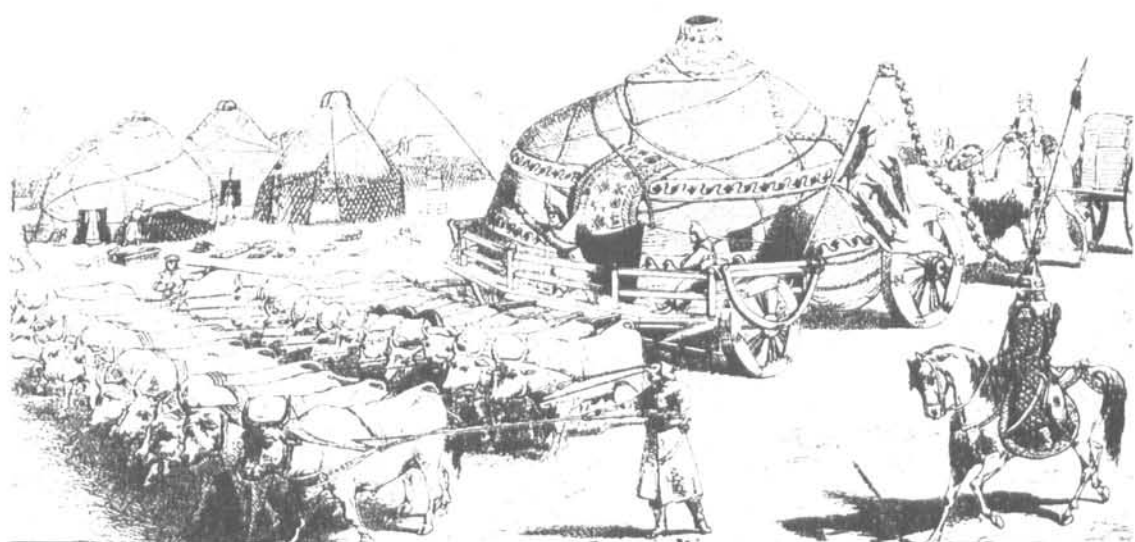
GENGHIS KHAN 生死与复活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生死与复活

[英]约翰·曼 JOHN MAN 陈一鸣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 001—008 引言 死亡与复活
- 009—010 第一部 根源
- 011—034 第一章 《秘史》的秘密
- 035—049 第二章 蒙古人的到来
- 050—058 第三章 新国家的曙光
- 059—080 第四章 野心之根源
- 081—099 第五章 通往权力之路
- 101—102 第二部 帝国
- 103—117 第六章 白上之国(西夏)
- 118—127 第七章 进入中原
- 128—158 第八章 穆斯林大屠杀
- 159—167 第九章 大征伐
- 168—181 第十章 寻求永生
- 182—191 第十一章 最后的征战
- 193—194 第三部 死亡
- 195—208 第十二章 死亡之谷
- 209—229 第十三章 去往秘密墓地
- 230—249 第十四章 帝国的扩张
- 251—252 第四部 复活
- 253—277 第十五章 次神的塑造
- 278—291 第十六章 寻找陵墓
- 292—320 第十七章 在圣山之颠
- 321—329 第十八章 长生天的预言
- 330—334 参考书目
- 335—336 鸣谢

引言 死亡与复活

2003年3月,美国《人类基因学》杂志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一个有23位基因学家的小组对来自欧亚大陆约2000名男人的DNA进行了多年研究。令他们惊异的是,在几十位接受测试的人员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共同的样本,尽管其来源各不相同。这种略有地区差异的相同基因样本,分布于从里海到太平洋这一广袤区域的16个人口群落。如果按拥有这种基因的受试者的比例(占16组中的8%)来推算整个该地区人口的话,令人吃惊的结论就是约有1600万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庞大家族的组成部分。

这一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资料来源于对只有男性才拥有的Y染色体的研究。每个男人在其Y染色体中都有一种可视为其独特“标识”的样本,但这种标识也有一些相似性,基因学家可以据此来确定其家族关系,而且它们也可以在称为“星团”(因为它们被描绘为星爆形而不是树形)的家族谱系中表达他们自己。第一步就是分析这些“星团”,通过时间和空间向上追溯,以确定其“最近共同祖先”。以30年为一代人,在追溯34代后,这个小组将他们的共同祖先锁定在了大约1000年前,这是个正负误差值在300年的中间数值(在我看来,每30年一代人听上去有点偏高,把它减少到比如说25年,最早共同祖先的出现日期就应在850年前)。此外,大多数轻微的地区差异只出现在这些选定地区中的一个,这就是蒙古。

这暗示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假设：一个生活在12世纪的蒙古男人，已经把他的基因传遍了半个欧亚大陆，其结果就是，今天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男人中，每200人中就有一人拥有这种基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是来听听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克里斯·泰勒-史密斯的解释吧：

“做这项分析的在读博士生塔提亚娜·泽尔扎勒的第一张网状结构图绘制出来，我们就从中得知，资料中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由于很高的频率，大量的邻人及其在众多人口群落中的广泛分布，这一‘星团’尤为突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代表着一个扩大的家庭。

“塔提亚娜立刻就说道：‘成吉思汗！’

“起初它似乎是个玩笑，但是当我们积累了更多的资料并且做一些计算来确定最可能的时间与来源地点时，结果表明：这可能是最好的解释。”

当研究者把这经过挑选的16组人群放置于一张由成吉思汗在13世纪早期创建的帝国的地图上时，证据出现了：两者之间吻合完美。虽然有一组，亦即阿富汗的哈扎拉斯处在边界之外，但实际上它也是相吻合的，因为成吉思汗在返回中亚之前曾于1223~1224年在阿富汗停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可以想见，这1600万男人的共同祖先就是成吉思汗直系祖先中的一位，他的兄弟们也可能拥有相同的样本。但无论情况如何，正是成吉思汗应该为这种基因样本于1209年到他死亡的1227年间，在中国北部和中亚的传播负有责任。在战争中，美女是战利品的一部分，索求其中最好的以及由下级官员的奉送则被看做是领袖地位的显示。成吉思汗在这点上是一丝不苟的：这不仅是其权威的象征，而且还是一种展示其慷慨的方式，因为好女子可以作为礼物转送给他忠诚的那颜们。成吉思汗并不纵欲，但他当然也不禁欲，在他为期40年的帝国建造的过程中，

他曾得到过数百名年轻女子。我们保守地估计他有20个孩子——但也可能有数百个之多——其中的10个是男孩,他们所有的人在其Y染色体中都遗传了相同的样本。假设他们每个人又有两个儿子,如果成吉思汗男性后裔的数字每代都在加倍,超过30代后,其结果就变得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至于在得出结论之前,这种计算已脱离了真实的世界。五代之后——大约在1350年——他只有微不足道的320个男性后裔;但又经过五代之后,即在1450~1500年,他有了1万个后裔;20代后这一数字就达到了1000万;30代后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十亿之巨。

那么,今天所发现的1600万后裔还是在现实的范围之内的。而且我们的祖先的繁育能力似乎只有极为出色才能达到这一点。把一些令人惊异的品质归因于突变是很诱人的,而突变又会使获得这种力量的人声名大噪。我们也许该假定一种冷酷的基因或是一种超级“种”的表现。事实上,这组研究者所研究的特别基因是中间性质的,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确定性别。所以在确保成吉思汗的血脉得以生存和延续的过程中肯定还会有某种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如克里斯·泰勒-史密斯及其合作者所说的那样,这种因素只能是纯粹的拥有广阔地理疆域的政治力量。政治力量为成吉思汗及其近亲所做的就如同雄孔雀的扇形尾羽所起的作用一样。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发现证明了在社会特权的基础上,人口选择的一种独特的结构”^①。社会学家和专栏作家很了解雄性之首在性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它在生物进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成吉思汗无疑是所有男性首领中的王中之王。

现在寻求对行为的基因学解释颇为流行。而这里存在于基

^① 塔提亚娜·泽尔扎勒等:《蒙古人的基因遗产》,美国《人类基因学》杂志,72卷,2003年3月。

因学背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可以追溯到一个出现在大约八个半世纪前蒙古草原的集战略天赋、驱动力、领袖才能、冷酷无情及许多其他品格于一身的人物。

本书是为寻求实现一个三十多年前形成的梦想的尝试,那时笔者想到某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去旅行,蒙古似乎和我所希望的一样遥远。在为此做准备时,我开始了学习蒙古语并且阅读了一些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献。随着青年时代的逝去,直到人到中年时,这次尝试理解成吉思汗对其所处的世界及对我们当今世界的影响的旅行才真正开始。

正如事实所示,的确有着某种影响。在(我们所说的)贫穷与屈辱或是(他自己所宣称的)上天眷顾的驱使下,成吉思汗成了一位征服者以及世界上最广大的陆地帝国的创建者,同时也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性质,不但活在其后裔的基因中,而且还活在这个由于其游牧武士的四处征战而永远改变了的世界中。所以,此次寻求之旅包含了两个方面:时间上,在我所能够找到的尽可能多的书籍的帮助下,回到过去;空间上,横穿中亚,从成吉思汗年轻时代生活的山脉,到他的许多征服战争的发生地,再到他可能死亡在那里的那个隐蔽的山谷,最后到达那座被他视作神命之源的圣山,而且极有可能他就长眠于此山的某个神秘的墓穴中。然而,成吉思汗并没有安静地躺在那里,他的帝国把蒙古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其延续数世纪之久的令人震撼的政治与社会的结果,甚至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的蒙古人,今天仍然处于成吉思汗的影响之下。

1995年,《华盛顿邮报》宣称成吉思汗是“过去一千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千年辉煌的故事,就是某单一物种将其意志完全地强加在了这个世界的结果”。回到公元1000年,全世界的人口不到三亿(一些估计数仅为5000万),

其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相对于其他民族或其他大陆,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除少数几十个北欧海盗外,欧亚大陆没有人知道美洲;而北半球除极少数勇敢的腓尼基人外,也没有人到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经居住在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对澳大利亚一无所知。尽管亚洲人与罗马帝国的东部残余有贸易往来,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欧洲。总而言之,每种文化都生活在被气候、地理环境以及无知所限定的范围之内。

今天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村庄,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技术、经济、疾病以及许多其他巨大的、非人工的力量都在发挥着它们的作用。还有数不清的个人也有着同样的影响,一些领袖人物、发明家、探险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与其他人相比,则更多地把人与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这位《邮报》的研究者所指称的“汗先生”当然也是如此。

成吉思汗的征服铸就了东西方之间的一种新的连接。他和他的继承者建造或重新建造了现代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叙利亚、中亚的一些新国家、乌克兰、匈牙利、波兰的基础。这些征服重新调整了世界的主要宗教,影响了艺术,建立起了新的贸易模式。时至今日其影响依旧是欧亚历史的基石。

但是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呢?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与那场由向我们地球村形成的巨大跃进所引发的革命——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或许只是重新发现,北欧海盗在公元1000年所建立的联系已从记忆中消失)相提并论?如果我们必须选择一位千年人物,难道哥伦布不会领先于成吉思汗吗?

一句话,不会。与成吉思汗相比,哥伦布更像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表象。如果没有打开新的世界,其他人也会,因为除哥伦布以外的许多其他人都在被推动着进行探险,他们及其支持者们都踏上了寻求中国的旅途。为什么是中国呢?因为它沿着

所谓丝绸之路带来的财富,自从罗马时代起就已经极富传奇色彩,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对贸易的限制;也因为马可·波罗在其早于哥伦布两个世纪之久的旅行中,已经证实了在大汗忽必烈(或者库布拉,就像他在英语世界里广为人知的称呼那样)的号令之下,中国就是世界财富之源。马可·波罗先生之所以能够设法到达中国是因为13世纪时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又被重新打开。道路的开通则是由于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人此时统治着从东欧到中国的广大区域,而忽必烈的统治又是因为他继承了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帝国遗产。

当蒙古帝国陷于分裂后,欧洲人经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旅程被重新复活的伊斯兰文化所阻断。当然,贸易的流通仍可经由海路进行,但这种旅行对欧洲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商路被阿拉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以及中国人自己所控制。从另一个方向,亦即西向经未知海域缩短去往中国的路程,是哥伦布一个伟大的构想,而美洲只是碰巧就在途中。因此,通过一系列巧合的延续几近三世纪之久的撞击效应,成吉思汗的帝国梦想也为新大陆的重新发现与殖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所有这一切几乎化为乌有。1227年8月成吉思汗已经征服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即将获得中国北部这一最大的战利品,这也将是不断征服的关键点,然而就在此时,他却去世了。这个消息将极可能鼓舞蒙古敌人的斗志,并使成吉思汗的帝国梦想化为泡影。这一刻,整个欧亚大陆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处于两个可能的世界的平衡之中。然而正如事实所示,成吉思汗死亡的秘密如其所希望的那样得到了很好的保守,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胎死腹中。1227年8月标志着历史上的一次意义最为重大而又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秘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时至今日仍然有两大秘密

强化着成吉思汗之谜：其一是他是怎样死的、死在了哪里？其二是他是怎样被埋葬的、被埋葬在哪里？第一个秘密使得他的后继者有时间来适应他的去世，有时间去实现他的征服梦想。第二个秘密则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他在今日普通人心里与记忆中的存在。

在成吉思汗继承者的统治下达到巅峰的帝国，分裂成了几个独立的实体，譬如中国、中亚、伊朗、俄罗斯，并在一个逐渐的蜕变与消散的过程中消失殆尽。今天研究蒙古帝国的影响变得等同于历史学界倾听宇宙大爆炸之低语的射电天文学家。这些低语之一刚刚被克里斯·泰勒-史密斯及其22位助手听到并放大。在曾经是蒙古帝国边缘地区的其他地方，还有许多这样的低语。

但在成吉思汗帝国的核心地区，他的名字响亮而又清晰，在那些行色匆匆的崇拜者中，他的残暴被人忘却或者忽略了。在蒙古，由苏联引发的长达七十多年的压抑后，人们可以自由地举着他的画像游行，庆祝他的生日并且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所有物品，譬如流行乐队组合、啤酒、体育运动队、研究所，等等。而在中国，他则被当做了元朝的创建者而受到崇拜。

在这两个国家，崇拜他的蒙古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因为成吉思汗已经在一种古老的崇拜中变成了神圣的中心人物，而这种古老的崇拜显示出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进化为新宗教的迹象。它的中心坐落在中国的内蒙古，在一座中国人称为成吉思汗陵的辉煌的建筑内。而蒙古人给它的更为准确的称呼则是“圣主禁地”，因为它并非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陵墓，从来就没有过一具尸体。在这里，成吉思汗的神灵被作为祖先、王朝的创建者以及圣人受到杂有佛教及萨满教因素的仪式的顶礼膜拜。双手落膝的高达4米的大理石坐像，是无数祭拜仪式的中心点；崇拜者对着“遗物”焚香祈祷；而壁画则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架起东西

方之间桥梁的天才，而沉溺于奇迹、爱戴与赞美之中的学者、商人和艺术家就是经过这座桥梁而往来于各处的。

关于这座陵墓有许多令人好奇的地方。它是现代的，并且由实际上是在其身后将他追封为元朝创建者的中国所支持。而对我来说，最奇特的则是，对他的崇拜有着真正的宗教的渴望，在这种渴望中，成吉思汗是作为这样一种力量而出现的，亦即真正的教士可以通过他与蒙古人支配一切的神灵——长生天取得联系。

在其信徒的信仰中精神复活的成吉思汗，绝不仅仅像过去一样只是一种减少痛苦的方法；它还是一种未来的精神希望。对于一个生于默默无闻、软弱无力而又贫穷不堪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转变。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01
—
根源



第一章

《秘史》的秘密

这是1228年7月中旬蒙古草原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大多数这样的日子里,孤独的牧人会听到湛蓝的天空中百灵鸟的歌唱,以及脚下蚱蜢的嘶嘶声。在大多数这样的日子里,这片远处浅山环抱、坡下溪水潺潺的草原,除了一两个蒙古包、一群羊、几匹拴着的马之外,显得格外空旷。然而在这一天,百灵鸟及蚱蜢的歌声却被其他声音所淹没。这里的一切正在被一个规模宏大的意义非比寻常的忽里台(古代蒙古诸王与贵族的大型聚会——译者)改变着。巨型四轮车隆隆驶来,这种车由每队十二头甚至更多的牛牵引,车上七米见方的平台载着毛毡与绸缎制成的蒙古包,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方形,每一个蒙古包都是诸王及其随从的流动宫殿。身着锁子甲或披着缀有重重叠叠金属片铠甲的那颜们彼此高声喊叫着互致问候。成群结队的牧人们以家庭为单位,有人骑马,有人骑骆驼,年长的妇女则乘着两轮马车,赶着羊群、驼群及马群,随其所在千户,在草原上慢慢扩散开来,直到抵达远处的山麓,或顺溪流而下,向南数公里,一直延伸到一条又宽又浅的河的两岸。穆斯林及中原的奴隶们则从喧闹的马车或驼背上卸下哈那(蒙古包墙壁的格状支架——译者)及搭建蒙古包所需的成捆的毛毡。身着长袍护甲、头戴皮质

头盔的护卫们骑着马来回奔走维持秩序，斜挎在腰间的箭袋装着短弓和十余支形状各异的箭。穿着长及脚踝“德勒”（蒙古语“衣服”的音译，即蒙古袍——译者）的牧人们则为了即将到来的盛宴忙着宰羊。孩子们拾来用作燃料的干畜粪，把它们架成堆。一会儿蒙古包里炊烟缭绕，炊烟漫过门帘，欢快地向大草原天际升腾，妇女们捣动着发酵的牛奶，制作各种奶酒。

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规模的忽里台，但其重要性却无法与这次相比。在二十余年的征战之后，蒙古人现在成了中亚、俄罗斯南部以及中国西部历次战争的胜利者。那年夏天参加这次忽里台的人，有的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有的来自满洲、新疆以及新近征服的中国北方的农耕区。他们的领袖，集结蒙古百姓，创建了这个国家并使它踏上了通往帝国之路的成吉思汗已于一年前辞世。而成吉思汗为期40年的统治及其胜利，证明了他的断言：他就是那个在长生天的护佑下被上苍选中的人。现在他的意愿必须得到执行。这次忽里台就是确认成吉思汗选定的继承者，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所必须举行的仪式。

这次忽里台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占领整个中国。这是成吉思汗尚处在最伟大征服边缘时所草拟的宏大战略，也是一件长城以外的“蛮夷”首领从未做过的事情。然而，这也仅仅是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理想的一部分。在1228年的忽里台上，许多人都听说到，在西边，在穆斯林的陆地及俄罗斯的森林与平原的尽头，仍然有其他的世界有待征服：譬如匈牙利的草原，也许甚至还有西欧富裕的城市。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他们统治世界的使命需要拥有与他们逝去的首领相一致的策略和凶悍，以及对他的意志的完全服从。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帝国即将作为欧亚最强大的实体而出现。

为什么在这里举行忽里台？这里有着另一个与四处漂泊的游牧民族以及远征的骑兵文化并不相符，然而对这次特别的忽

里台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原因。这里遗留有一些石头的建筑，大约排列成一条直线，就像一堵绵延半公里的墙。一个顶部平坦的大土堆俯瞰着这些建筑，土堆上的柱子支撑着一个侧边开放的顶子。居住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不需要建筑物，然而这些坚固的建筑显然已在那里矗立了许多年。它们实际上是永久性的军事要冲，必要时会有蒙古包、车辆及成千上万的武士列阵守护。土堆上的大帐有着检阅台、会议中心以及萨满教寺庙的三重功能。

这个地方最初名叫奥鲁，是蒙古人最早的固定的首都，建于12世纪的某个时期，那时他们刚刚拥有了统一及征服的梦想。对该地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对其战略地位的考虑。它扼守进入其部落摇篮的北部山区之要冲，南临蒙古人的蒙古包所对之吉祥的方向。它的附近有一眼古泉，据说这里的泉水具有治疗的功效。奥鲁是一个古老的蒙古语词汇，意为“源泉”。在大河以南600公里处，广阔的草原逐渐转变成了沙石遍地的戈壁荒漠，这对于那些准备穿越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条宽阔的快速路。接下来就是黄河，到达财富与危险之源——中国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蒙古人可以从奥鲁发动进攻，集结增援部队，从事征服战争，必要时可以从这里逃回他们的山区腹地以寻求庇护。

尽管奥鲁已为蒙古人自己所熟知，但很少有外人听说过它，它也几乎不见于史乘，因为在此次忽里台不久之后，它就被放弃了。成吉思汗已经命令在更加遥远的西部，在更适于统治其日益扩张的帝国的地方修筑一座新都。不久，这座新都城便以哈喇和林之名而闻名于世，尽管奥鲁并没有被民间的记忆忘却，但这座新都城在13世纪的兴起导致了奥鲁的衰落及其在历史上的消失。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它最初的名字也已消失。当这个古老的蒙古语词汇不再使用时，通俗语源学采用了一个读音相似并且含义亦相符的词汇——阿布拉格，意为“庞大”与“冠

军”(一个给予顶级摔跤手的称呼)。由于蒙古语正字法有其自身的模糊性,所以中间的ra也可以颠倒。如果在发音图上有它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两种形式:Avarga, Avraga。两者均不能构拟出阿布拉格的准确发音,因为最后的a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赘音。现在我们就来探寻一下“阿布拉格”吧。

几个世纪以来,阿布拉格的石头被埋在沙土之中,它成了蒙古的卡米洛(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译者),一个没有实物资料证实的传说中的地方。但在1992年,一个由日本资助的联合考古队携带探地雷达来到了这里。虽然这个以源于肯特山脉的三条河流而命名,以寻找成吉思汗的陵墓为目的的“三河计划”失败了,但它的成员却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并作出了诸多论断(其中的一些相当大胆与矛盾,对此本书稍后将论及)。“三河计划”考古队使用雷达对阿布拉格的12个神秘的土堆进行了探测,并记录到了表明沟渠与城墙遗迹存在的回声。但他们的报告却是肤浅的,而实际发掘的一个坑也仅仅出土了一些无法确定年代的石器。尽管如此,这仍旧是阿布拉格曾经存在的第一个有力的证据。

1228年阿布拉格的忽里台绝不仅仅标志着一个战略与政治的转折点,它也是一种激励。蒙古人已经了解到他们正处在一些重大事件的中心,他们已经成了远非昔日可比的伟大民族,比他们见到的除中国人以外的任何民族都要伟大,而且他们开拓疆土的愿望也日益膨胀。这一不可思议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许多阿布拉格的与会者在成吉思汗的征服之初就已追随他了,其中几个最年长者几乎在60年前的孩提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他们完全可以共同向他们自己以及未来的几代人解释这种变化。

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因为在那些诸王、那颜、护卫及家